

史传与文学

邓裕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史传与文学

邓裕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传与文学/邓裕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8

ISBN 978 - 7 - 5161 - 8773 - 9

I. ①史… II. ①邓… III. ①史记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689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75
插 页	2
字 数	339 千字
定 价	8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
科研经费资助

目 录

绪 论	1
一 史	1
二 史传	7
三 史学与文学	9
第一章 史传与民间文学	11
第一节 史传与民间谣谚	12
第二节 史传与神话、传说	53
第三节 史传与寓言	89
第二章 史传与诗歌	108
第一节 诗史情缘	108
第二节 史传中的诗歌	126
第三节 《史记》与《诗经》	158



第三章 史传与古代散文	176
第一节 史传与叙事散文	177
第二节 史传中的其他散文	215
第四章 史传与小说	238
第一节 小说与史乘的渊源	238
第二节 史传与小说的互动	278
第五章 史传与古代戏曲	303
第一节 史传中的倡优	305
第二节 史传对古代戏曲的影响	336
主要参考文献	374
后 记	377

绪 论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最重视历史，又最善于记载历史。史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古老、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伴随着我们这个民族走过了漫长、曲折的历程，记载、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也为中华文化、思想的培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史

“史”字有三义：历史；史官（史家）；史书（史册）。

1. 历史

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但在通常的语境下，历史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即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足迹，社会文化、文明的进程。有了人，就开始有了历史。历史涵括了已往人类生活、生产的一切活动，是先人的经历、体验、智慧、情感、信仰、习俗等的总和，它的厚度和深度，是一个民族进化



程度、文明程度的反映。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深厚的历史底蕴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浅薄的，而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如果说未来是将来时，充满未知和变数，那么历史则是过去时，已往的史事虽然已经盖棺定论、不可改变，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①。对于一个永远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来说，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扬优良传统，继承前人的思想文化精华，继往开来，科学地把握历史的走势，从而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使这个民族永远兴旺发达而至无穷，就极为重要，这也是我们重视历史、学习历史的意义所在。

2. 史官（史家）

史官或史家，这是“史”字的本义。《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又”实际上就是手，“史”字的形象意义为双手持中的人。“中”乃指简册。章炳麟《章氏丛书·文始》：“中，本册之类。”所以“史”就是掌管典册的人，亦即掌史之官，简称史官。

《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文心雕龙·史传》：“《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

这些地方所称的“史”，指的显然都是史官或史家。

中国古代的史官由来已久，早在远古的黄帝时期，就已经有了史官。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史官之作，肇自黄帝。”

传说黄帝的史官有二人：一为沮诵；二为仓颉。《世本·作篇》：“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矣。”晋人卫恒《四体书势》云：“黄帝之史，沮诵、仓颉。”《文心雕龙·史传》：“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这二人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史官。

^①（东汉）高诱注：《战国策·赵策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黄帝乃华夏民族的先祖，大约活动在原始社会的晚期，所处仍是比较蒙昧的神话时代，但此时已经设立了史官，史官文化也就随之产生。中国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实非虚言。

史源于巫，最初的史官是由巫来充任的。巫可谓中国古代最早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这些人掌握早期社会几乎全部的科技、文化知识，包括天文、地理、数术、历法、军事、历史、乐舞、医药、技艺等，他们参与主持祭祀、占卜、祈禳，以及驱鬼避邪、婚丧庆生、求医问药等活动，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他们当中的拔尖人物进入朝廷，便成为朝廷中的巫官。《曲礼》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这里的大史、大祝、大卜都是由巫来充任。

由于巫官具有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实际上直接参与了朝廷的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角色，在负责解释天象、龟筮占卜、预测国运兴衰和军政大事成败等之外，还要为朝廷起草文书，发布文告，记录与国君有关的事件和言论，即《汉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之谓。巫官所记录的相关事件和言论，涉及政治、军事、外交、人事、宗教及自然界的重大变化，这些便是后来史书的基本素材。担任这类工作的巫，事实上就成为史官。史官通巫，巫官通史；巫即史官，史官即巫，这种现象大概一直延续到西周初年。

中国是个史学的国度。近代大学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这最为发达的史学，居功至伟者显然非史官莫属。史官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早期，史官实际上是文化的主要掌管者。他们又是古代精神产品的主要生产者，许多著名的文史典籍，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都出自史官之手，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巨大的贡献。《隋书·总序》曰：“史官既立，经籍由是兴焉。”《新唐书·艺文志序》也云：“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



于史官之流也。”这些对于史官的创作及其贡献的评价，都揭示了史官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史书堪称古代的百科全书，所记涉及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内容包罗万象，一应俱全，因此史官也必定是通晓百科的专家和学者。《隋书·经籍志》“史部”总序：“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二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由于我国古代文史之间的天然联系，史官与文学结缘最深，古代许多史官都是大文豪，如司马迁、班固、干宝、范曄、房玄龄、魏徵、欧阳修、司马光等，不仅是雄视千古的史学家，而且是声名卓著的文学家。司马迁、班固、魏徵、欧阳修等人，甚至还是著名的思想家、历史上的思想巨子，他们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后人。

总而言之，古代史官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贡献非常独特而且非常重要，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他们的著述保存和创造了大笔的精神财富，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3. 史书（史册）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书”者，写也、记也。《史通·史官建置》：“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无论军国大事、外交会盟、宫廷生活，甚至房中之事、床第之私，史官都必须记录。史官所写、所记的这些内容的书面形式，便是史册或史书，即前面《说文解字》中“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的“中”——简册之类，也就是本书的题目“史传与文学”所要讨论的“史”的文本。

上古没有文字时，先民结绳记事。《庄子·胠篋》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可见轩辕黄帝的史官仓颉，起初也是结绳记事、记史的。在文字产生



之前，显然没有书写性质的“史”，也就没有一般意义的史书或史册。书写性质的史册，当产生在文字使用之后。

结绳而记的“史”不仅粗陋，而且年久月深，难于辨识，这对部族的内部治理十分不利。相传仓颉有感于此，便辞官出游，遍访智者，寻求记事的好方法。《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说文解字序》也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他独居村西深沟之中，仰观奎星环曲走势，俯看龟背纹理、鸟兽爪痕、山川形貌和手掌指纹，从中受到启迪，终于依照事物的形状创造了象形文字。

《易传·系辞传下》云：“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仓颉造文字，然后书契始作，则其始也。”

从结绳记事到文字记事，不仅方便了族群的治理，而且为先民的记事、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准确、高效的工具和手段，也是史册、史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实乃华夏民族文明进程的一大飞跃。因此，如果相关传说属实的话，那么，仓颉就不仅是中国文字的始祖、最早的史官，也是最早以文字记史的人。

翦伯赞说：“文字的记录，始于记事，故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举凡一切文字的记录，皆可称之为史。”^①清代章学诚也说“六经皆史”（《文史通义》），认为《诗》《书》《礼》《乐》《易》同《春秋》一样，都属于“史”的范畴，所以古人心目中“史书”的含义是很宽泛的。按此说法，中国古代的史书简直浩如烟海，它们面貌多样，名目各异。但这些宽泛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带有“史”的性质的书籍，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对象，此处只讨论历朝官方或正统史官编修的、今人公认的纯粹的史书。

我国古代的史书，素有“正史”“野史”之分。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正史”所指，有两种说法：一是指从《史记》《汉书》起直至《明史》共24部以帝王传记为纲领的正统纪传体史书，亦即“二十四史”，在清代乾隆年间朝廷组织编修的《四库全书》中被确定；二是以纪传、编年二体合称正史，这个提法见于《明史·艺文志》。通常以前一种说法更为流行。

《四库全书》规定，正史类史书“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非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可见，二十四史是由皇帝钦定的。其实，编年体史书如《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还有国别体史书如《国语》等，都是官修的正统史书，但都被《四库全书》排除在正史之外，而《史记》是司马迁的私人撰述，却居二十四正史之首，这表明清统治者对于正史的确定，看重的并非其官修的身份，而是纪传体以帝王为中心、突出统治者在历史上地位的撰史特征。

所谓“野史”是指私人撰述的史书。如《唐书·艺文志》所载的《大和野史》，宋代郑樵《通志》所载的龙衮的《江南野史》之类。由于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的关系很密切，历史上也有人称小说为野史。野史之“野”有两层含义，一是“朝野”之“野”，与“朝”相对，即在野，表明野史作者的非朝廷、非官方身份，乃民间自主、自由的著述者；二是粗鄙，指野史的内容、体例较为杂乱，记述较为随意散漫，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成分较多，可靠、可信的程度低。

总体而言，历代史官多是学界权威、文坛巨子，史学、文学的修养都比较高，著述态度严肃、条件优越，虽然因身份、地位和思想所限，修史主要体现统治者的意志，为官方服务，有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文过饰非的现象，但不能否认正史的体例规范，著述严谨，内容丰富充实，也经过严格过滤和筛选，可靠、可信的程度比之于野史更高。当然，也不排除在某些史实，或者对待某些问题上，野史能记人之不能记，言人之不敢言，记述更加接近事实真相，持论更加客观、独到、深刻、犀利的情况。



对于古代的史书，有所谓“二十四史”“前四史”之说，这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这些历朝正史的总括性称呼。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纪传体正史的总称。具体是：

《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徵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即《史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又被称作“前四史”，实际上是晋前的几部纪传体史书。

以上这些历朝的正史中，文学性较强，文学成就得到公认，能被后人称之为“史传文学”的首先是《史记》，其次是《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其他正史在文学史上则很少被人提及。换言之，这4部之外的二十多部，并未被人们列入文学的范畴，只是在史学研究中备受重视，而鲜有学者从文学的角度对之进行观照和研究，在文学的殿堂里已经没有了它们的席位。

二 史传

“史传”之名，最早见于《文心雕龙·史传》：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



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①

刘勰在这里说了三层意思：一是史官的产生。黄帝轩辕氏时代，就有了史官仓颉。用史官主持记录政事的职务，这个事实已经很早就存在；二是阐述史官和史册的功能。史的意思，就是“使”，使史官拿着笔站在朝廷的两旁，替帝王记事。左史记述帝王行动，右史记述帝王语言，记述语言的经书就是《尚书》，记述行动的经书就是《春秋》；三是阐述“史”和“传”的关系。传的意思，就是“转”。把经书的意旨转述出来，把它传授给后代，《左传》就是圣经的羽翼，史传的代表作品。

刘勰把解释经文的文字叫作“传”，《左传》就是用来解释《春秋》的，所以是“传”。《春秋》是“经”，是史书；《左传》是“传”，也是史书。这样，就把史和传联系起来，合称“史传”。由此可见，“史传”其实是一个集合词，包含了“史（经）”和“传”两个对象。既然两者都是“史”，两者之间在记载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所以两个对象的内涵、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共同的，也就是说，此处“史”和“传”两个词的词义是相通的。与此同时，刘勰在篇中还论述了其他许多既不是“经”，也不是“传”的著作，比如《国语》《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晋纪》等，将之与“经”“传”相提并论，这其实是刘勰对于“史传”这个概念的外延的进一步扩展。由此可知，刘勰所谓的“史传”，实际包括“经”“传”“史”各类史著，亦即东晋以前的各体史书，史传文学中的“史传”二字的含义，就是据此而得。

刘勰只论到东晋的史书，而且将之当作一种文学体裁来看待，一

^①（南朝·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3—284页。



是因为他主要活动在南朝（齐），可能只看到东晋之前的史书（其实南朝的刘宋时期也有范晔《后汉书》等著名史著，刘勰不曾提及，可能是没看到，也可能是疏忽）；二是在此之前，文史尚未有明确的分野，文学与史学关系密切，他的意识中仍然持早期的传统的大文学观念，视文史为一家。当然，他并没有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史传，而是从史学的角度来衡量。在论述过程中，刘勰分别对东晋以前各种史书的性质、特点及其高下优劣逐一评论，而对于史著撰述的原则和要求，经、传、史并无特别的区分，都主张“务信弃奇”“实录无隐”“按实而书”等。篇中不仅反映出刘勰文史不分的观念，也反映了他经、传一家，史、传一炉的史学观念。这种文和史、史和传之间互相混融的事实，正是我们“史传与文学”立论的基础，也是本书讨论对象、范围确定的依据。

三 史传与文学

史传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史传本身就是文学。史传是文学，首先是一种观念的认同，也就是早期人们对史学与文学同类、同体关系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其实是先秦文史不分的现实状况的一种反映，是特定历史背景、条件的产物。其次，将史传认定为文学也有事实上的依据。史传在本质上虽然是记史述往的文本，但其确实蕴含文学的性质、特点和韵味，其叙事的形式、手法和格调，即历史事件的叙述、历史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篇章结构的谋划安排、语言的表达、细节的描写、情感的抒发与表达等，都堪与文学作品相比肩，可以被文学引为同调。所以，视史传为文学的观点，在观念上和事实上都是有所依傍的，有双重的支撑。

其二，史传作为文学，其本身与各个种类、体裁的文学如民间文



学、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很大的关联性。可以说，史传与这些文学种类、体裁之间的关系是血肉相连、割舍不断的，对史传与各体（种）文学稍加考察，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如题材上的共生共荣、互为来源；体裁上的互通互用；表现手法上的互相借鉴；以及史传对于各体文学文本的插入、兼容；对于各体文学史料的收载、评论等，都是很常见、很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既反映了史传与各体文学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依存和促进，也表明史传在古代文学发展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因此，探讨史传与各体文学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显得很有意义。本书所进行的研究正是在这方面的一些初步尝试。

本书以后一种关系为基本框架，在论述过程中融入前一种关系的内容。以文学成就较高的《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较全面地探讨史传与民间文学、古代诗歌、古代散文、古代小说、古代戏剧等各体文学的关系，揭示史传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共生现象。

第一章

史传与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的口头文学，也是人类最早的文学形式。在还没有产生文字的远古时代，人们便通过口头创作了原始歌谣、神话、传说等文学作品，用以反映原始先民的劳动、生活、愿望和情感，这也是最早的历史记载。寓言的产生比歌谣、神话、传说都晚，是人类社会进入比较高级的阶段，人们的语言、思维能力、价值判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才创作出来的作品。寓言以形象的故事来说理，反映了早期人们对社会事物的理性思考和认知。

原始歌谣、神话、传说及寓言，既是文学艺术的早期形态、后世各体文学艺术的源头、文人作家精神和艺术营养的源泉，也是早期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的反映，后世史书的重要素材。因此，以歌谣、神话、传说及寓言为代表的民间文学，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史学等，都起到一种哺乳的作用，对于具有文学和史学双重性质，在诞生时间上与早期民间文学更接近的史传来说，这种作用更加直接，也更加明显和重要。